

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升居民对不同类型文化和活动的满意度。其次，创新文化活动形式、增强文化消费的场景性，促进居民将文化消费作为休闲娱乐、子女教育等日常生活实践的组织方式，培养广泛的文化品味，提升居民对不同类型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第三，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引导居民对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和理想信念的认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中增强文化自信。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数字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研究”（2023YZD0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朱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数字社会文化发展新特征：基于文化生态理论视角

高文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是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文化建设首先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当前，人类进入数字社会，如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一样，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产与生活，包括从文化生产、传播到消费的文化发展路径。在这一背景下，对数字时代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也是对如何进行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回应。文化发展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关联紧密，很难独立于社会环境因素去对其进行。因此，本文试图在文化生态理论视角下，构建一个框架来理解文化发展所要分析的问题，作为文化发展研究的一种策略。

一、文化生态理论视角看文化发展

文化生态理论视角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主张从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生产、发展、变异规律。^①“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斯图尔特于 1955 年在《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提出，认为可将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生态学引入文化研究之中，因为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和关系与之类似，相似的生态环境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相异的生态环境则形成相对的文化形态。^②后续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将文化生态理论视角的研究分为了两个方向：第一种是将文化生态作为影响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经济、政治、教育、技术、社会制度、人口结构等^③，研究这些外部生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这与斯图尔特最初的文化生态的理解相一致^④。第二种则是将文化本身视为一种文化生态，其中包含各种文化构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⑤，这种研究取向既研究文化与外部复合的生态环境的关系，又要研究文化内部构成的关系^⑥。数字社会文化发展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文化发展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还应包含文化内部不同构成的特点和相互作用的探究。因此，本文将采用第二种文化生态的研究视角进行分析。

此外，在以生态学视角研究个体和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中，研究者还会将时间维度引入分析之中，认为

①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99 页。

② Steward, J. H.,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p. 5; 朱利安·H. 斯图尔特、潘艳、陈洪波、陈淳：《文化生态学》，《南方文物》2007 年第 2 期。

③ Oishi, S., Graham, J., “Social ecology: lost and found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pp. 356–377.

④ Mark Q. Sutton, E. N. Anderson, *Introduction to Culture Ecology*,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2004.

⑤ 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3 期。

⑥ 高丙中：《文化生态的概念及其运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

生态系统具有动态变化的特性，生态系统的各个构成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会随时间而变化。^① 文化的发展同样发生于文化生态动态变化过程之中。因此，文化发展的研究框架中也应纳入文化生态的历时性分析。

二、数字社会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分析框架构建

本文将文化发展的分析置于文化生态框架中进行，文化生态包括影响文化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文化构成。外部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纷繁复杂的环境因素中，本文沿着影响文化发展的“背景—形成—传承”脉络，重点关注了三方面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可以反映文化发展所处一般社会环境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有不同的划分依据，鉴于社会形态是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本文关注的又是数字技术变革下的文化发展。因此采取技术划分方式，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的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来划分和理解社会形态变化。第二个因素是与不同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影响文化形成的社会连接方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人类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进而影响社会组织方式和运行逻辑^②，这些是影响文化形成的人类活动基础。第三个因素是能够反映文化传承发展的社会教化模式。社会教化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主要指家长和社会如何教导和养育儿童。通过社会教化，文化观念会深入人心，影响人们的认知、道德、情感、行为和人际关系等。^③ 社会教化模式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文化价值的新特点，又会通过文化价值的传递，影响文化发展路径。

内部文化构成方面，对文化的组成要素有不同的划分逻辑。从结构上，由表及里可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层面文化可理解为人类的物质性产品，最活跃、变化最快；制度文化或社会文化可理解为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的共同准则，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继承性；精神文化是一套意义系统，是人们共享的信仰、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图式，形塑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提供理解社会的参考框架，更具稳定和持久性。^④ 这种常见的类型划分方式更偏向于静态，而在生态系统视角下去分析文化构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有机协同变化，还需要更易分析机制和动态关系的划分方式。胡安宁基于文化多层本体论的特性，区分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种文化本体论^⑤，宏观层面文化类似于前述精神文化，是一套具有内部逻辑和语义一致性的系统，是一个地区共享的文化体系。微观层面的文化是个体基于自身独有的经历所形成的独有的文化表现^⑥，也可以理解为个体内化和诠释宏观层面文化后的文化实践^⑦。这样划分的优势在于，不仅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文化构成特点、两者在文化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有怎样的历时性变化，还可以探讨相对稳定的意义系统和可塑性更强的文化行为实践之间的动态关联，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历时性变化。基于此，本文将沿用这种划分形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文化生态中的内部文化构成特点。

基于此，本文对数字社会文化发展新特征的分析，是采取文化生态理论的分析框架（见表1）。通过分析文化生态中，社会形态、社会连接以及社会教化模式三种文化生态外部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来探讨文化生态内部文化构成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新特点。

表 1 文化生态理论视角下文化发展分析框架

文化生态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历时性变化			文化生态内部文化构成
社会形态	社会连接	社会教化模式	
农业社会	血缘、地缘，熟人社会	传统	宏观意义系统：多元交织与融合 微观个体文化：互构性与日常化
工业社会	+业缘，社会关系网络	传统—现代转化迭代	
数字社会	+趣缘，个体化网络	深度多元化	

① Bronfenbrenner, U., Evans, G. W., “Developmental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Emerging Questions, Theoretical Models, Research Design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Social Development*, 2000, p. 9.

② 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③ 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④ 赵志裕、康莹仪：《文化社会心理学》，刘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4页。

⑤⑥ 胡安宁：《识别文化的因果效应——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的前提》，《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1期。

⑦ 胡安宁：《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化传承：实践—认知图式导向的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三、文化生态外部社会生态环境的历时性变化

(一) 社会形态的历时性变化

如前所述,本文依据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来划分社会形态,在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形态的论述基础上^①,将社会形态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数字社会三个阶段。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在农业社会,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且往往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社会活动大多局限在土地所属区域开展。由于土地产物和其他生存资源有限,为了促进集体合作、保证分配规则为人所接受、维护人际关系和谐,形成了一种权威式的社会结构,并以当时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家庭为其基型。家庭以父子垂直关系为主轴,并把这种父子式的权威关系扩展至形成整体看重上下地位关系的社会结构。^②人们由此形成一套适应权威式社会结构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倾向,也就是宏观层面上的文化意义系统。

步入工业社会后,工业技术革命性的创新提升了生产效率,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集中于工厂所在地,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对土地的依赖,社会流动性增强,城市化进程加快。其次,经典的工业社会存在一定的共性,包括社会分工更加精细,职业化程度增强,报酬的分配依据贡献的大小,不同职业或专业群体间的经济关系增多。^③最后,伴随着流动性的增加,社会的家庭结构规模缩小,社会群体基本构成更多由家庭转为职业。^④基于这些特征,形成了重视契约关系的平权式社会结构。^⑤为了在这种结构下运作,人们需要形成一套新的文化意义系统。

而在数字社会,又一次重组了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业经济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主导,数字经济则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转型为主导,生产方式从倾向于线性和集中式、强调流水线作业和物理劳动,转向更为灵活和去中心化、强调知识创造及共享的智力劳动和远程工作。这种生产方式变革也让组织方式不再受限于物理和媒介,更为灵活化和网络化。^⑥网络相连的个人成为生产数据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是传递数字信息和参与社会互动的的基本单位。^⑦面对数字社会的新形态,人们又会形成一套新的文化意义系统来适应社会发展。

这三种社会形态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其历时性变化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地取而代之。相反,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社会形态会相融并存。^⑧一方面,由于科技发展速度迅猛,社会形态发生转变,但不同地方的变迁速度可能不一致。^⑨多种社会形态会同时存在,相应的多种文化意义系统也是同时存在。比如,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黑龙江垦区和深圳存在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以第一产业、国有农场经济为主导的垦区,更多表现出集体主义价值观,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经济的深圳,则更多表现出个体主义价值观。^⑩另一方面,就文化生态而言,其内部结构的变迁速度也不相同。根据文化“堕距理论”,不同文化构成变化速率并不一致,物质和行为等微观层面的文化更趋于表层,变化速度会较快;宏观层面的意义系统变化则较慢,并且会不断制约和影响前者的变化。^⑪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形成的文化意义系统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意义系统的消失,两者往往会同时存在。而且文化本身具有传承性,传统文化意义系统可能在新的社会形态中以新的形式发挥作用。^⑫

基于此,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社会连接和社会教化模式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既有旧形式的存留或转化,也有新形式的涌现,构成了文化生态中多元化的社会生态环境。

①⑨ 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1期。

② 杨国枢:《中国人的蜕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4—253页。

③ Karsh, B., Cole, R. 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Some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Jap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68, pp. 45—64.

④ 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连接与研究转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1期。

⑤ 杨国枢:《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能否同时并存?》,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价值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⑥⑧ 邱泽奇:《数字化与社会学的时代之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2期。

⑦ 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⑩ 高文珩:《“应然”与“实然”:社会文化价值特点与影响》,《学术交流》2015年第7期。

⑪ 徐平:《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国家治理》2014年第16期。

⑫ 胡安宁、余家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传统文化变迁: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二）社会连接的历时性变化

从前述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看，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和地理空间限制，社会流动性很低，血缘和地缘是人们形成社会连接最主要的形式，人际关系多是基于人们日常频繁交往而形成的稳定联系，形成费孝通所描述的“熟人社会”和维持这一社会运作的重视服从权威、家族集体优先的传统文化体系。

工业社会，社会流动性增强，人们走出村落和家庭，进入工厂企业等正式生产组织，在精细化社会分工的环境中开始通过业缘建立起新的社会连接，同时，在社会生活中结识很多区别于传统意义熟人的陌生人，并与之进行社会交往，形成各种基于契约的关系连接。人与人之间通过远近亲疏的关系经营，或通过契约和法规构建起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一关系网络中，随着业缘连接的出现，血缘和地缘连接虽然仍然存在，但一方面可能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比如血缘连接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连接范围缩窄，更多集中于小家庭而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大家族。另一方面，血缘和地缘连接对行为的影响力有所减弱。重视自主、个体优先的现代文化体系进入到了文化生态之中。

数字社会，在技术方面，数字技术和网络拓展了社会连接的边界、促进了社会连接的信息共享，提升了社会连接的时效，每个人都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绕过其他社会群体，直接进入社会连接之中^①，这就让人可以无需嵌入某群体或关系网络之中，就能与他人发生连接，形成个体化的连接网络。在结构方面，生产过程数字化形成了新的数智分工体系，数字经济创造了一些新的职业类型，传统工业化时代的职业群体成员之间互动发生变化，业缘连接有所减弱。在心理方面，在血缘、地缘、业缘这些基于社会人口属性的连接之外，越来越多人开始根据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特征、兴趣爱好、行为偏好等形成心理群体认同，并且因为这种连接更具主动性、选择性、参与性和建构性，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影响可能超出血缘、地缘认同。在数字媒介平台发展的推动下，这种基于“趣缘”的社会连接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常见。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社会连接的影响相应进一步减弱。注重个性、多元化的数字文化进入到了文化生态之中。

（三）社会教化模式的历时性变化

农耕文明下，中国传统的社会教化模式大多与两个主题有关，一是控制冲动，二是成就，这两个主题对应中国传统的家训所对应的内容，即孝悌和勤学。^② 如前所述，这种价值强调是为了维持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运作。传统教化模式中，父母往往一方面要求子女控制个体冲动、尊重和服从权威；另一方面重视子女学业成绩而忽视其心理需求。通过这种教化延续传统价值观。

进入工业社会，家庭关系从传统走向了现代，父子垂直关系为主轴的传统家庭关系转向以夫妻水平关系为主轴的现代化家庭关系，父系父权走向了夫妻平权和亲子平权，代际关系趋于平等，子女养育愈加获得重视^③，社会教化模式也发生变化，比如形成新的孝道观念，比如越来越重视儿童对独立人格和情感体验的需求。但在一些家庭中，传统社会教化模式对家长的影响仍然存在，听话、上进的评价标准影响着现代社会教化模式。^④ 社会教化模式处于传统与现代并存、寻求有机融合、实现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

进入数字社会，传统社会教化模式又受到了新的挑战。在家庭之中，父母已经不再是知识、技能甚至观念的绝对权威者，孩子们接收信息的渠道极大丰富，有了更广博的知识，接触到了更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父母的“教育者”角色受到挑战，如果扮演传统社会教化模式中的权威者，其说服力可能会受到质疑。难以通过传统社会教化模式中的权威形象去评判孩子的行为。要想通过社会教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就需要文化表达和教化模式的创新，现代社会教化模式与传统社会教化模式的有机结合又会呈现更多形式，社会教化模式进一步多元化。

总之，文化生态中外部社会生态环境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数字社会的变迁，影响文化形成的社会连接方式以及影响文化传承的社会教化模式，都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在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中，数字社会的文化生态内部的文化构成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① 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连接与研究转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1期。

② 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③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王震宇、唐灿：《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④ 高文珩：《青少年网络游戏问题行为的文化—社会—个体三因素分析——基于网络游戏问题行为的91个电话咨询案例》，《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5期。

四、文化生态内部文化构成的新特点

（一）数字社会宏观文化意义系统的多元交织与融合特性

通过对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变化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数字社会,同时存在为顺应农业社会形态、工业社会形态和数字社会形态而形成的不同、甚至有冲突的文化意义系统。这些意义系统并不会按照出现顺序先后而消失,而是呈现多元共存状态,但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存续的强弱有所不同。比如研究发现,有些价值是终极性的、与社会适应无关,比如真、善、美相关的价值,这些价值受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变化影响较小,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区别不大或变化很少。有些价值则是为了适应传统社会形态才形成的,如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男性优越,在现代社会形态中,这些价值观的强度会减弱,或内涵会有所改变。而与之相对应的现代价值观念,如平权开放、独立自主、积极进取、两性平等,则会强度逐渐增强。^①但由于宏观层面的文化变迁速度较慢,这些价值观念的强度变化需要一定的过程。

第二,数字媒介能够助力传统文化构成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融合进新的文化意义系统。社会经济、科技、物质转型往往速度较快,但文化意义系统变迁是缓慢的,因此就让当前很多人面对多元文化意义系统无所适从,触发其民族文化自觉的需求,以解决价值认同的危机。数字社会网络平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赋予人们生产或重构文化符号、意义和价值的能力。人们可以基于“趣缘”在网络平台形成兴趣群体,对感兴趣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价值传统的象征意义进行重新创造,使其符合现代价值表达,融合进现代文化价值体系中。比如“汉服”就是由青年在网络平台创造的文化空间中“被发明的传统”,被赋予了文化共同意义,又因为能表达个性,最终融合进了现代文化系统中,成为流行的文化现象。^②

（二）数字社会微观个体文化日常化与互构性特点

与宏观文化意义系统相比,微观层面的个体文化实践更容易受文化生态中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步入数字社会中,个体文化实践形成了以下新的特点。第一,从文化实践场所来说,数字连接的便利性和广泛性让很多文化实践活动都依托于互联网和数字媒介而进行。《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近 11 亿人,占总人口 78.0%。一项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 35668 名 18—70 岁网民的抽样调查显示,98.65%的网民都通过互联网参与过各类文化活动,如看短视频、看影视剧或综艺、看新闻、听音乐、看直播、看书、线上看演出、社交媒体使用等。^③第二,从文化实践的可及性来说,数字社会文化活动通过网络已经嵌入日常生活之中,文化实践体现出了去仪式化和碎片化的特征,文化参与成为庸常,日趋日常化。第三,从文化实践的主体看,由于数字社会的社会连接方式的变化,除了前述基于“趣缘”形成连接参与文化活动之外,人们还会通过媒体保持与他人、与世界的“连接”^④,只要习惯性地一触就能看到他人的生活切片,也可一键发布自己的日常、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就引出了第四个特征,从文化实践结果看,数字社会的文化实践活动不再是被动消费文化产品,还可以生产、创造和传播文化内容。人们作为产消者(prosumer)参与到文化产品生产创造之中,如在网上发表图片、文字或音视频、进行直播、发弹幕、发表评论等,都可以成为文化空间的组成。文化生产和消费形成互构关系。第五,这种互构性还存在于文化生态宏观和微观的文化系统之间,宏观文化意义系统指导、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实践选择,而互构性的文化实践又可能生成新的表层文化,如物质文化或新的文化实践形式。表层文化或亚文化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有可能形成更深远的影响,比如影响宏观意义系统。

五、文化生态分析框架研究文化发展的可能方向

本文提出采用文化生态分析框架去研究文化发展的一种可行性策略,将文化生态区分为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和内部文化构成系统。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分析了与文化产生背景、形成过程和传承相关的三种社会环境因

① 杨国枢:《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能否同时并存?》,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价值观》。

② 杨雪、张冉、孔令旭:《“传统”的再造与流行——对青年汉服文化演变逻辑的考察》,《当代青年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第 440—453 页。

④ 何塞·范·迪克:《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晏青、陈光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103—133 页。

素，包括社会形态、社会连接和社会教化模式。通过分析其历时性变化，来探讨文化构成中宏观的意义系统和微观的个体文化在数字社会所呈现的特点。在这种分析路径之下，未来可对数字社会文化形成和发展开展系统化的研究。

第一，数字社会文化意义系统的形成和引导研究。文化发展的目标之一是促进积极的社会价值共识的形成。依据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数字社会、社会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受两种路径的影响。一是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中，社会连接、社会教化模式也发生转变，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可能会形成新的文化价值或是重构传统文化价值。二是数字社会，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的颠覆性变化，往往直接体现并作用于微观的个体文化实践层面，作用于微观文化和宏观文化之间的互构机制，在此基础上影响到宏观文化意义系统。未来可在文化生态分析框架下，对两种路径开展研究，寻求促进积极文化价值观共识形成的策略。

第二，数字社会文化生态外部社会生态环境的特点研究。以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为例，社会形态转变的历时性过程中，不同社会形态中涌现的社会连接和社会教化模式是相融并存的，它们并存的情况如何？哪些占据主导地位？如何相互融合？有哪些群体性和区域性差异？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厘清。对此，可采取横断面和纵向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针对性研究当前文化发展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解释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和阶段性，从根本上促进文化均衡发展。

第三，数字社会文化生态外部环境和内部构成之间的机制研究。根据文化生态理论，外部环境的变迁会影响内部文化构成中各部分的变化。本文从整体上讨论了一些环境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背景下文化的特点。未来可以开展具体机制研究，比如外部社会生态环境中的某一变迁如何影响某一层面的文化？这种影响是否会受制于文化生态中其他因素？由此，深化对文化生态变化的理解，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文化发展政策。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数字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研究”（2023YZD0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高文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本组笔谈责任编辑：朱 颖）

Culture,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ymposium)

LI Peilin, CHEN Yunsong, ZHOU Yi, ZHU Di, GAO Wenjun

Abstract: Cultural sociolog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socialist cultural nation. The five essays in this issue aim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innovate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methods, and construct a new cultural sociology. Li Peilin analyzes the complex intellectual journey of Chinese scholars towards traditional culture since modern times,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forming Eastern modern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and elaborates on the origins and pathways. Chen Yunsong proposes the “cultural lineage sociology”, which is an autonomous cultural sociological knowledge system focusing on the temporal-spatial structure of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s role in shaping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Zhou Yi views ideology as a symbolic form of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discovering how these symbolic meanings serve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mass, producing social effects in the everyday life world. Zhu Di proposes tha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modernization in which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re coordinated; the building of an attractive and vibrant cultural civilization system can alleviate the identity anxiety in modern society, and cultivate more holistic and persistent cultural confidence. Gao Wenjun suggests utilizing a cultural ecolog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as a viable strategy for conducting systematic research on cultural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digital society.

Key words: culture,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ulture construction